

《清水江文書》序言

陳春聲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六十多年前，傅衣凌教授在其研究民間契約文書的著作《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的〈集前題記〉中，這樣描述民間文書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意義：

誰都知道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應注重於民間記錄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對於素為人所不道的商店帳簿、民間契約等等都珍重的保存、利用，供為研究的素材。在外國且有許多的專門學者，埋首于此項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貴的著作。而在我國則方正開始萌芽，本書對於此點也特加注意，其所引用的資料，大部份既從福建的地方誌，寺廟志以及作者于民國二十八年夏間在永安黃曆鄉所發現的數百紙民間文約類輯而成，皆為外間所不經見的東西。這一個史料搜集法，為推進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

傅先生一再強調「把活材料與死文字兩者結合起來」的研究方法，主張要把文獻分析與實地調查相結合，「接觸社會，認識社會」，「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證史」，努力回到歷史現場去，從而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另一位重要的奠基者梁方仲教授，也高度重視民間文獻在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的價值。梁先生在〈易知由單的研究〉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過去中國田賦史的研究，多以正史和政書為限。這些材料，皆成於統治階級或其代言人之手，當然難以得到實際。比

較可用的方法，我以為應當多從地方誌、筆記及民間文學如小說平話之類去發掘材料，然後運用正確的立場、觀點去處理這些材料，必須於字裏行間發現史料的真正意義；還給他們真正的面目。然而這類工作，無異沙裏淘金，往往費力多而收穫少。除了書本上的材料以外，還有一類很重要的史料，過去不甚為人所注意，就是與田賦有關的實物證據，如賦役全書，糧冊，黃冊，魚鱗圖冊，奏銷冊，土地執照，田契，串票，以及各種完糧的收據，與憑單都是。

梁先生受過嚴格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訓練，而以研究明代賦役制度著名。他對歷史上經濟問題的關注，植根于對現代中國農村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懷之中。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他特別重視社會調查，曾多次深入農村調查土地關係和農民田賦負擔問題。他致力於各種公私檔案的收集和解讀，力圖在整理、辨析、解讀官方數位的基礎上，結合對納戶糧米執照與土地契約等票據文書的考釋，為後人提供逐步深入揭示社會經濟事實的一條路徑。

學術史的發展證明，梁先生、傅先生等前輩學者指出的方法，乃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正途」。近年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最引人注目的成績之一，就是研究者們在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的收集、整理、利用方面所做的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努力。我們相信，這樣的工作不僅具有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歷史背景之下，「搶救」物質型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不僅只是具有學術積累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間文書、地方文獻和口述資料的基礎上，建立並發

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間與地方文獻的解讀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建立在更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的關鍵環節之一。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學者們，已經發展出一套較為系統的解讀鄉村社會中各種資料的有效方法，包括族譜、契約、碑刻、宗教科儀書、帳本、書信和傳說等。這種或許可被稱為“民間歷史文獻學”的獨具特色的學問和方法，是傳統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或漢學家都沒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許多有成就的地域社會經濟史研究者一直保持其學術自信心和創造力的最重要基礎之一。

正是由於這樣的理念，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自2001年成立以來，一直將傳統中國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作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教育部、中山大學和海內外多個學術基金組織的支援下，在華北、華東、華南和西南的多處地方和東南亞的華人華僑聚居之地進行實地調查，與當地的文史工作者合作，開展大規模且有深度的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的收集和整理。《清水江文書》就是這一學術努力的成果之一，這項工作是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與貴州省錦屏縣的有關政府部門合作完成的。

在民間文書和地方文獻收集和整理工作中，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特別注意堅持以下四項原則：一、儘量通過與地方政府和本地研究機構的合作徵集或複製文獻，而絕不在鄉村收購民間文書；二、儘量將文獻和檔案原件保留在原地，特別是儘量永久收藏於當地的圖書館或檔案館等公藏機構，以利於以後研究者的工作，研究中心只收藏文獻的複印件或數碼圖像；三、儘量保持文獻和檔案原來的系統和內在聯繫，不打亂文獻原有的系統，絕對不根據現代研究者的需要對文獻重新分類；四、除與合作機構或文獻收藏者有特別約定者外，研究中心收藏的文獻都對學術界開放，並努力儘快公開出版。我們相信，這樣的做法是對學術和社會負責任的表現。在收集、整理清水江文書的過程中，我們一絲不苟地實踐了以上四項原則，也正因為這樣，這項工作得到錦屏縣政府和各鄉鎮幹部群眾的理解和大力

支持。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學術研究需要的不僅是資訊溝通、思想碰撞與學術批評，不僅是研究者對社會發展和文化傳承的深刻關懷，對代表人類未來、良知、公正、平等種種理想境界的追求，學術研究資料的公開出版和被學術共同體共用的便利，同樣也是達致這一目的必由之路。正因為如此，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在從事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的收集與整理時，都把文獻的出版列為重要的工作內容，並注意與合作的地方政府部門和學術機構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以清水江文書為例，2001年9月此項工作剛剛開展之際，我們與錦屏縣有關部門確定的《錦屏民間契約文書徵集研究工作計劃》，就明確提出了「用5—8年時間，將錦屏民間所有的契約等歷史文獻悉數收集，並規範整理、出版系列選輯」的工作目標。很高興的是，事隔五年，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支援下，《清水江文書》開始系列出版，當年確定的工作目標正在逐步實現。民間文書大多是稿本，其收集和整理帶有搶救文化遺產的意義，通過公開出版，使之成為學術界同行可以共用的學術資源，不但有助於吸引國內外的學者們更加關注這樣的研究課題，更加關注這些文書形成地域的社會與文化發展，而且可以克服資料壟斷所帶來的種種不便，讓有關地域社會的專門研究有更多的得到同行檢驗的機會。

在清水江文書收集、整理和出版的過程中，張應強和王宗勳兩位學者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張應強教授現任職於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故鄉卻在清水江邊。王宗勳任職於錦屏縣的檔案和方志部門，一直在清水江畔從事地方歷史文化的研究。應強是苗族人，宗勳是侗族人，兩位與清水江有著割捨不斷的血緣和情緣的苗族和侗族學者，志同道合，一起從事數百年來主要由苗族和侗族先人創造的清水江文書的整理與研究，這樣的工作，不但具有學術積累和思想發明的價值，而且也可以被賦予某種民族文化傳承的象徵意義。應強在本書的序言中，已經詳細描述了清水江文書收集與整理的過程，民間文書徵集和整理工作中的種種艱辛，非親歷其境者實在難以想

象。正是因為參與其事者對學術事業和文化傳承的執著追求，才使清水江文書的收集整理工作有了今天這樣的基礎。這兩位學者的學術精神，已經使許許多多前來清水江地區考察的海內外學者深受感動，而他們在這一工作中形成的深厚友誼和相互理解，更是讓我們這些從旁觀察的朋友們感到羨慕。除了這套資料叢書外，應強已經有兩部利用這些資料的研究專著問世，宗勳也有包括《錦屏縣誌》在內的多種文史研究作品深受同行好評。最近兩年，張應強指導的多位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也選定清水江流域作為其學位論文的研究地域，而王宗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這些同學田野工作的引路人和指導者。我很想借著這套資料叢書出版的機會，祝願這兩位正值學術創造能力最為旺盛年齡的學者，紮根鄉土，鍥而不捨，取得更大的成就。看到比他們年輕的同學們繼續在清水江兩岸的侗鄉苗寨進行田野工作，學術事業後繼有人，更是感到由衷的欣慰。

《清水江文書》的出版，只是一項在學術史具有深遠意義的長期工作的開始。除了越來越艱巨的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仍有

待深入外，對這些珍貴歷史文獻的解讀和研究，更是任重而道遠。我們都強調自己的工作學有所本，同時也相信自己的追求屬於一個有上千年歷史的學術傳統的自然延伸。我們都熱愛自己的研究，熱愛自己所研究的人們，也熱愛他們祖祖輩輩生息的山河和土地。在大多數情況下，歷史人類學研究者們所從事的是一項與個人的情感可以交融在一起的研究，學術傳統與個人情感的交融，賦予這樣的工作以獨特的魅力。但大家對於做學問的目的，還是有著更深沈的思考。我們希望在更廣泛、更深刻的意義上，在學術發展的道路上，留下一些痕迹。希望這樣的研究，最終對整個中國歷史的重新建構或重新理解，會有一些幫助。同時，我們也期望這樣的工作可能與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主流有一些更多的對話，可以參與到一個更大的學術共同體共同關注的問題中去。

是為序。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六日

于廣州康樂園馬崗松濤之中

活動消息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合辦

西貢滯西洪聖誕考察
(下午考察糧船灣西貢天后廟)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上午八時三十分
西貢公眾碼頭集合
有意參加者須先行報名

報名及查詢：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23587778 傳真：23587774